

翻译研究的肇始期：经验的沉淀

一直以来，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就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前者孕育于爱琴海诸岛，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达到鼎盛，并随着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铁骑扩散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乃至中东的广大区域。然而，公元前3世纪，随着罗马共和国迅速崛起，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被逐个消灭。公元前30年，马其顿王国最后一个继任国——托勒密王国覆灭，希腊化时代¹正式结束。不过，作为征服者的“蛮族”罗马人并没有摧毁希腊文明，反而以极大的热情吸收并发展了希腊文化，从而形成了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希腊罗马文化（Greco-Roman culture）。正如当代古典学家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2015: 1）所指出的那样：就大多数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子，希腊人的重孙。²

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特别是希腊文学的继承，主要是通过翻译实现的。公元前240年，卢修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ucius Livius Andronicus）受托为罗马节节庆活动编写演出剧本，他首次将希腊剧本译

1 通常认为，希腊化时代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逝世）持续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国覆灭）。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逐渐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新的特点，故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希腊化时代。

2 本书中的引文翻译，除非特别注明，均为本书作者所译，特此说明，不再另注。

入拉丁语并搬上舞台，这一创举掀开了罗马文学史的大幕，使后人争相仿效。开创了文学翻译先河的罗马人同时也是西方翻译思想的始祖，他们留下的许多关于翻译的经典论述，不仅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同时也给整个西方翻译思想史带来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目前已有的翻译史研究并未对古罗马翻译思想给予足够充分的讨论。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2001: 248-249) 曾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注重“翻译经验”，标志着该阶段大致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古罗马的西塞罗 (Cicero) 和19世纪初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该阶段有关翻译的经典论述均来自译者的亲身实践和体验。在斯坦纳看来，这一阶段的翻译论述还只是关于翻译问题的初步探讨和技术分析，不能称之为理论。路易斯·G. 凯利 (Louis G. Kelly) (1979) 也认为，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应该包含三个部分——对功能和目标的说明、对操作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对目标与操作之间关系的批评性论述。然而，很少有学者能够提出一个广泛适用的翻译理论。粗略看来，西方早期的翻译论述的确零散不成体系，与当代翻译理论相比显得幼稚和粗糙。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古罗马翻译论述的价值在翻译研究者的眼中往往只停留在翻译操作层面，或者说研究者关注的仅仅是那时的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

传统的“直译”“意译”之争主要关注译者在译文中多大程度地再现了原文，却往往忽略了翻译发生的具体语境 (Hatim & Mason 2001: 6)。这种脱离文本语境谈论翻译策略的取向有一定局限性；同样，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谈论传统译论的做法也不可取。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以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2004) 和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2006) 为代表的研究者逐渐超越了语言转换的层面，结合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对译论史进行重新挖掘和解读。在翻译学科奠基之作《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 中，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2002: 18) 将文化与翻译列为翻译学的首要议题，并指出翻译

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四大板块之一，它包括历代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的委托和出版过程研究、特定时期翻译的历史角色和功能研究、翻译方法的发展研究及译者作品研究等。

文化观照下的翻译理论史研究意在发掘各种翻译论述背后的翻译动机、身份意识和文化归属等过去未得到翻译界充分重视的问题；而历时性的翻译理论史研究则既要关注同一时期的译者和翻译批评家在其独一无二的语境中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个体思想特征，也要把握每个时代的翻译思想的共性，并在此基础上厘清这些思想的发展脉络。

本章对于古罗马翻译思想的讨论即是文化关照下的历时性的翻译理论史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为500年，即从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至西罗马帝国崩溃(公元前60年—公元476年)。在此期间，古罗马最重要的语言——拉丁语，从一个区域性语言上升为欧洲的通用语言，关于翻译的论述也多以拉丁语撰述，其主要贡献者则是活跃在拉丁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拉丁语与其他欧洲语言的交流，特别是与希腊语的交流是这一时期西方翻译史的核心，流传至今的史料也最为丰富。若将拉丁文学发展脉络与政治历史进程相结合，大致可以将拉丁文学的发展史划分为六个阶段¹，而本章讨论的译论史横跨其中三个阶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教父时代。

1.1 黄金时代前期：西方翻译思想之发端²

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分为两个阶段，西塞罗便是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人

1 这六个阶段分别是：(1) 早期(公元前240年—公元前84年)；(2) 黄金时代(公元前83年—公元14年)，又分为西塞罗时期(公元前83年—公元前43年)和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43年—公元14年)；(3) 白银时代(公元14年—公元138年)；(4) 教父时代(公元2世纪末—公元5世纪)；(5) 中世纪(公元6世纪—公元14世纪)；(6) 文艺复兴(约公元15世纪)至今。参见Teuffel(1891)和Wheelock(2005: xxxii)。

2 本节内容发表于《中国翻译》2016年第2期，在原文基础上略有改动，已获得编辑部的使用许可。

物。他是古罗马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也是拉丁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的演说辞、修辞学和哲学著作以及大量书信，构成了古罗马拉丁文学的一座宝库。西塞罗被誉为拉丁文学之父，他所开创的拉丁散文风格被后世争相模仿，他创造的拉丁哲学术语和文学术语被广泛接受，成为拉丁语言的一部分。

西塞罗从青年时期便开始从事翻译实践，并在其修辞学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多次论及翻译，他的译论被后人频繁引用。自哲罗姆(Jerome)开始，翻译学界就将西塞罗奉为西方翻译思想史上反对硬译、倡导自由译的先驱，且一般将其视为西方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但在罗宾逊(Robinson 2007: 47)看来，“西塞罗并非第一个翻译理论家，他只是首先提出了如今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翻译方法”。其实，他的翻译思想远不仅限于对翻译方法的讨论。要真正理解其翻译思想，就必须跳出翻译方法的窠臼，进入其当时的历史语境。

从西塞罗生平来看，其翻译实践大致集中于青年求学时期和晚年时期；在这两个人生阶段，西塞罗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对翻译的思考、对翻译的诉求和采取的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

1.1.1 青年西塞罗：翻译与演说家的成长

青年时期的西塞罗翻译成果颇丰，既有诗歌翻译作品，如对阿拉托斯(Aratus)天文天象长诗《物象》(*Phaenomena*)的翻译，又有哲学翻译作品，如对色诺芬(Xenophon)的《经济论》(*Oeconomicus*)和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等的翻译(Jones 1959: 23-24)。从古罗马翻译史来看，当时的罗马人更热衷于希腊名剧的翻译，那么，青年西塞罗为何对天文学和哲学著作情有独钟？直到晚年，西塞罗才在《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揭开谜底。此时，他已是演说界的权威，对于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完备的理论。在《论

演说家》中，他借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迪弗斯¹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之口提出了一项重要观点：全面而扎实的知识储备是优美表达的基础，没有百科全书般广博知识的演说家不能称之为优秀演说家 (Cicero 1942: 17)。而年轻的演说家们要想达到这样的高度，就不应将眼光局限于传统的演说训练。显然，青年西塞罗就是这样走向成功的：他翻译天文学、哲学等看似与演说毫不相干的领域的著作，正是为了扩大视野，掌握百科知识，以提高应对各种主题的能力，为成为一名优秀演说家打下坚实基础。

翻译不仅能帮助演说学习者拓宽知识面，更能丰富其语言表达。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回顾了自己在青年时代为提高拉丁语表达的探索历程：他先是模仿一些拉丁语范文并试图对其加以改造，却发现最优美的词汇已被使用，无法再有突破；之后他找到了另外一种更为有效的词汇扩充方法——“自由地翻译 (translate freely) 最著名的希腊演说家的演讲”——“当我把读到的希腊文转换为拉丁文时，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使用最优美却又极常见的拉丁语词，而且还通过类比创造出了一些对我们来说全新的词汇……” (Cicero 1942: 107)。

作为演说练习的翻译实践采用的是自由式的翻译方法，译者无须向原作和原作者负责，更不必追求译作的准确性。从理论贡献来看，西塞罗率先将文学翻译从社交消遣领域拓展到了修辞教育领域，最先将文学翻译的修辞教育功能理论化并写入书中。他对翻译的这一独特应用得到了后世演说家如昆体良 (Quintilian) 的肯定和推崇，而他所说的“自由地翻译”则演变成了西方翻译界的关键词——自由译² (free translation)。

1 下文也写作李锡尼·克拉苏。

2 西方翻译界所言的“自由译”与中国翻译界所说的“意译”并不完全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看，前者的自由度可以远远大于中国翻译界所认同的“意译”的自由度。

1.1.2 精英西塞罗：翻译与文化征服

公元前80年，26岁的西塞罗因赢得一场重要诉讼而声名鹊起，跻身罗马顶尖演说家之列 (Petersson 1920: 104)。此后，西塞罗进入了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他36岁成为罗马公认的最具名望的辩护律师，43岁被选举为罗马执政官，达到了政治权力的巅峰 (Petersson 1920: 1)。在其政治生涯最为活跃的时期，西塞罗的文学活动明显停滞。直到公元前56年，远离权力中心的西塞罗才重新拾笔撰文。从一开始的《论演说家》一直到最后的《论义务》(*De Officiis*)，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间，西塞罗创作的修辞学和哲学著作有近20部。这时的他大力翻译希腊哲学作品，希望借此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期望希腊人的伦理思考对罗马同胞有所裨益，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扭转族人对本土拉丁文学的偏见，从而推动拉丁文学的发展。

作为罗马精英阶层的一员，晚年的西塞罗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希腊哲学的学习者，而是希腊哲学的引入者和批判者。在《论法律》(*De Legibus*) 中，西塞罗 (Cicero 1928: 391)¹ 写道：“翻译他人的思想实在是简单，要是不想做我自己，我也可以翻译。用几乎同样的字眼去表达他人表达过的思想，何难之有？”因此，西塞罗此阶段的翻译与青年时代的哲学翻译不同，基本没有以篇章为单位的全文翻译，更多的是以引文形式出现在其作品中的段落式翻译。西塞罗认为，经过自己批评和编辑并用优美拉丁文呈现的希腊哲学作品，已然具备了与希腊哲学家们的原著相抗衡的分量，完全可以取而代之，成为古罗马的哲学经典。例如，《论至善和至恶》(*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借用了柏拉图著作中的对话形式来讨论希腊的伦理哲学流派。虽然其中有些重要引文的翻译非常贴近原文，明显倾向于直译 (Powell 2007: 1135)，但在西塞罗看来，自己的作品比直接翻译原著更具价值：

1 《论法律》约作于公元前52年，这里参考的是其英译本。这本于1928年出版的书中还收录了《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 的英译本。

假如我们并不仅仅是一名译者，而是在保留我们所选的圣贤之言的同时，融入我们自己的批评和条理：那些反对者们¹又有什么根据，把希腊文凌驾于这些风格优美且又并不仅仅是翻译的作品之上呢？

(Cicero 1914: 7)

西塞罗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一名罗马精英的文化心态：热切期待罗马在语言和文学力量上能超越希腊。但究竟该如何超越？在《图斯库兰讨论集》(*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中，西塞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发出如下号召：

我号召所有有能力这样做的人，从气数已尽的希腊手中夺取这门学问（哲学）的优秀成果，让这些成果成为我们城邦的财产；就像我们的先人以坚持不懈的热情将希腊的其他艺术形式一一运送²过来一样……一旦我们把这些学问都运送过来，希腊的图书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Cicero 1886: 91-92)

显然，西塞罗认为，希腊的哲学思想成果如同罗马在征服希腊之后所缴获的其他战利品一样，只要罗马需要，就完全可以掠夺它、改造它，并最终将其化为罗马自己的财产。

1.1.3 演说家西塞罗：翻译与自我捍卫

晚年时期的西塞罗除了在哲学翻译上倾注心力外，有一篇演说辞的译序《论最佳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 也颇为引人注目，此译序已成为西方译论史上的经典。但从历史语境来看，此译序的写作目

1 这里的反对者是指那些排斥阅读拉丁语哲学作品的罗马人。

2 西塞罗在此处频繁使用的“运送”一词，拉丁原文为 *transferant*。它是 *transfero* 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在古罗马常用来表达“翻译”之意，在有些英译本中被译为 *translate*。

的不是讨论翻译问题，而是要通过解读何为“真正的”阿提卡派¹及规定何为最佳的演说家，来反驳一些年轻演说家的质疑，捍卫“西塞罗式”演说风格的正统地位，维护其社会资本。关于西塞罗在文中探讨的翻译问题，后人往往关注的是他在两种翻译方法之间的选择，却忽略了演说家与译者这两种身份选择背后的文化意蕴。身份不同，其翻译价值取向和选择的翻译方法也不相同。西塞罗之所以拒绝以译者的身份来翻译，既是因为在古罗马的社会阶层中，演说家身份远比译者身份高贵，也是因为罗马的译者往往缺乏修辞学教育，难以胜任文学翻译。西塞罗以演说家这一身份来翻译希腊演说辞，既与翻译目的的高尚性——教育后辈演说家相契合，又保证了译本质量。

在《论最佳演说家》中，西塞罗从一名演说家的角度，对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翻译演说辞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不是作为一名译者，而是作为一位演说家来翻译的。我（在译作中）保留了与原作相同的思想和形式，或者说“思维方式”，但使用的是符合我们讲话习惯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我认为无须作词语对词语的翻译，只需保留原作语言的总体风格和气势。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把作品内容像数钱币似的数给读者，而应当让读者感受到它们的分量。

（Cicero 1949: 365）

在西塞罗看来，若以译者的身份来翻译，那就意味着要采取词语对词语的翻译方法（即“硬译”），就像把原作内容如同数钱币似的数给读者；而若以演说家的身份来翻译，则意味着主要保留原作语言的总体风格和气势（即他所采用的“自由译”），让读者感受到原作的分量。从现代译论的

1 阿提卡大区是希腊传统的分区之一，其中心城邦为雅典，演说术由此发源和兴盛。阿提卡派则代表了公元前1世纪初兴起的回归雅典质朴风格的演说风潮。

角度来看，西塞罗的这段译论从演说辞的文本类型特点出发，将语言风格视为翻译的关键要素。在他看来，要再现原作的风格和气势，就必须在翻译中有所取舍。在《论最佳演说家》的末尾，西塞罗（Cicero 1949: 373）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成功的翻译应该保留原作的所有优点，包括思想、修辞和结构顺序等方面；而译者对原作语言的跟随，应当以不背离本族语的语言习惯为前提，对于这种跟随的尺度的把握，他认为不必逐词逐句地对应，而应尽量在语词类型上与原作保持一致。

古罗马时期没有“硬译”这个术语，而用“词语对词语的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来表达相同的意思。这是因为，古罗马时期的一些译者在翻译《圣经》时，觉得就连原文的语序都有着某种神秘的含义，在翻译时唯恐违背上帝的旨意，因此往往采用逐行对照、一词对一词的译法，故称“词语对词语的翻译”（简称“词译”）。在西塞罗的话语体系里，与其对应的另一种译法是“自由译”。显然，这两种说法都还不是一种术语化的呈现方式，这也正是翻译研究前理论时期的一种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一贯的“自由译”的主张相比，西塞罗此时的翻译主张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点：（1）原作的地位有所提升；（2）译者的自由度有所减少。这种以再现原文为导向的忠实观既不符合古罗马文学的翻译传统，也与西塞罗寻求自我表达的一贯主张明显脱节。从历史语境来看，西塞罗之所以强调自己的翻译与原文接近，是因为他希望读者相信自己的拉丁语译文没有篡改希腊语原文，而是保留了正宗阿提卡演说的精华与气势；他的译本完全可以替代原文，成为阿提卡演说的拉丁语标杆。可见，西塞罗是想借助这项特殊的翻译活动，以特殊的翻译策略来实现捍卫自己演说风格和地位的这一终极目标。

尽管西塞罗在《论最佳演说家》中所表达的对原文的重视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观点却为翻译的忠实观日后成为主流的翻译观埋下了伏笔。400年后的哲罗姆因一份不甚忠实的译文而受到指责时，便引用了西塞罗《论最佳演说家》中的翻译论述来为自己的意译策略辩护。

由此，西塞罗和他的《论最佳演说家》被认定为古罗马意译思想的源头。哲罗姆根据西塞罗的“词语对词语的翻译”，以类比的方式创造出“意义对意义的翻译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这一术语(简称“意译”)，二者相互呼应，使翻译的二分法变得更为清晰工整，便于传播。直至今日，二元对立式的翻译方法仍是翻译理论中总结翻译方法的经典范式，只是在不同理论中的表达方式和角度略有出入而已。正是由于哲罗姆对西塞罗译论的“经典化”，使得西塞罗成了西方翻译思想史上意译派的先驱、“词译”“意译”二分法的创造者以及以原文为导向的等值思想的启蒙者。然而，无论是青年时期的西塞罗，还是晚年时期成长为罗马精英分子的西塞罗，其翻译行为都体现出将原文为我所用的强势姿态，其翻译主张虽在论及目标语的自由程度时与后世的意译思想有相似之处，但背后的文化意蕴却已明显超越了以原文为导向的语际转换层面的词译和意译。

1.2 黄金时代后期：诗歌翻译之要义

拉丁文学黄金时期的第二阶段是奥古斯都 (Augustus) 时期。与西塞罗时期显著不同的是，此时罗马的共和制已被元首制取代，原来的公民大会、元老院等政治机构形同虚设；大殿之上的政治演说已辉煌不再，逐渐走向衰落，而诗歌艺术则由于元首奥古斯都对文人的荫庇和扶持，繁荣更胜往昔，涌现出维吉尔 (Virgil)、贺拉斯 (Horace)、奥维德 (Ovid) 等杰出诗人。尽管在古罗马诗人们的创作中，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他们对于翻译的直接讨论却并不多见，仅有寥寥数篇流传后世。其中，贺拉斯的翻译论述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他的金句被后人频繁引用，他本人则被尊崇为意译派的典型代表。

1.2.1 翻译与模仿

贺拉斯对拉丁文学的一大突出贡献是将希腊诗歌的格律引入了拉丁诗歌。他在创作中也借鉴了很多希腊元素。当时的罗马国力鼎盛，国民对过分追随希腊文化的行为十分敏感。贺拉斯的《长短句集》(*Epodes*)和《颂诗集》(*Odes*)出版后，就有批评家指摘他的作品缺乏原创性，只是在单纯地模仿希腊作品。在《书信集》(*Epistles*) 1.19¹中，贺拉斯向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²倾诉，并为自己的诗歌辩护：

啊，模仿者，你们这群奴隶，你们的喧哗时常让我恼怒，也时常惹我发笑。我是在一片处女地上留下自由足迹的第一人，我走的是他人未曾踏足之地。人若相信自己，必能统领苍生。是我最先将帕罗斯(*Paros*)的短长格(*iambics*)³展现给罗马人。我追随的是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节奏和精神，而非他侮辱⁴吕坎拜斯(*Lycambes*)的主题或言语。你们不要因为我不敢改变诗歌的格律和形式，就给我戴顶稀疏的桂冠。看看英气勃发的萨福(*Sappho*)是如何从阿基罗库斯的节奏中锻造出了自己的缪斯，再看看阿尔凯奥斯(*Alcaeus*)又是如何找寻到了自己的灵感……此前的阿尔凯奥斯无人诵读，而我，一名拉丁姆⁵的诗人，却让他声名远扬。我的快乐就是带来了前所未闻之事，让贵人们捧在手中，看在眼里。

(Horace 1929: 383)

1 贺拉斯的《书信集》共有两部，此处的1.19是指第一部中的第19封信，下同。

2 贺拉斯在潦倒之际，朋友维吉尔将其引荐给奥古斯都的谋臣梅塞纳斯。这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为贺拉斯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贺拉斯的诗才得以发挥，创作了许多传世之作。

3 这里所说的短长格后来发展成为欧洲格律诗的基本节奏——抑扬格。抑扬格在音节有长短之分的语言中表现为短长格，而在音节长短不明显的语言(如英语)中则表现为轻重格。

4 原文中使用的是*hound*一词，本书作者结合上下文、所引文献的脚注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翻译时作了一定的修辞性补充，以帮助读者理解。

5 拉丁姆为意大利古地区名，后扩展为意大利中西部的拉齐奥大区。

贺拉斯认为是他首先将短长格引入拉丁语言，其他跟在后面的罗马人只是在拙劣地模仿。而针对那些称其诗歌一味追随希腊形式、缺乏创新性的批评意见，贺拉斯则以希腊诗人间的相互模仿为例，来证明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模仿和借鉴之上。这种模仿和借鉴既可以是语内的，如萨福和阿尔凯奥斯从本族语诗歌中汲取灵感；也可以是语际的，如贺拉斯对阿基罗库斯和阿尔凯奥斯的效仿和翻译。

贺拉斯认为，文学模仿是有优劣之分的，作为模仿的一种形式，翻译也同样如此。相对于主题和言语，他认为格律和精神更值得模仿。至于如何才能恰当地模仿希腊文学，贺拉斯在之后的《诗艺》中作了详细的解答。

1.2.2 文学翻译的功能

上文提到，贺拉斯(Horace 1929: 383)如此表达自己对于文学翻译功能的理解：“我的快乐就是带来了前所未闻之事，让贵人们捧在手中，看在眼里。”可见，同西塞罗一样，贺拉斯将翻译与拉丁文学的发展以及对拉丁民众的教育联系起来，体现出强烈的功用主义倾向。他在《书信集》2.1中有这样一句名句——“被征服的希腊人将艺术带到了粗鄙的拉齐奥，以此征服了他们野蛮的征服者”(Horace 1929: 409)。从上下文看，他是在比较希腊和拉丁两种文化的优劣，并主张罗马取长补短，构建更为强大的文化。因此，本质上贺拉斯和西塞罗抱有同样的精英使命感，他们赋予了翻译活动超越文字的文化竞争精神以及振兴罗马文化的使命。在《书信集》2.3中，也就是后来被昆体良称为《诗艺》(“Ars poetica”)的书信中，贺拉斯进一步表达了对罗马本土文学的赞赏以及对其超越希腊文学的期待。但贺拉斯也清醒地指出，要实现这样的诗歌成就，罗马的诗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自己的诗人对于各种(创作)风格皆有尝试，他们敢于不追随希腊人的足迹，而歌颂本国的事迹，他们将本国的题材写成悲

剧或喜剧，搬上舞台，并赢得荣誉。只要我们的每一个诗人都能忍受打磨作品的艰苦和辛劳，我们拉丁姆人的文学成就也绝不会亚于我们的赫赫战功。

(Horace 1929: 475)

1.2.3 诗歌翻译的策略

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如何才能在吸取希腊诗歌的精华的同时，保证自己的独立精神？针对这些问题，贺拉斯在《诗艺》中作出了解答。他在书信的前半部讨论如何在诗歌创作中选择题材、组织材料及呈现材料时，充分肯定了借鉴希腊文学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文学新手创作的捷径。但他同时指出，在模仿时一定不能作一名“奴性十足的译者”：

……不要像一个奴性十足的译者 (slavish translator) 般作那种词语对词语的翻译，不要在模仿的时候自陷窄井，既怕被人耻笑又怕触犯写作规则，裹足不前。

(Horace 1929: 461)

“不要像一个奴性十足的译者般作那种词语对词语的翻译”，贺拉斯此语与西塞罗《论最佳演说家》中的那句“在翻译过程中，我认为无须作词语对词语的翻译”形成了明显的互文关联。不难看出，贺拉斯不仅和西塞罗一样反对词语对词语的翻译，他对于“奴性十足的译者”的轻视和西塞罗对于“仅仅是一名译者”身份的不屑也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他们更看重的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超越，而不是没有任何创意的鹦鹉学舌。

贺拉斯在《诗艺》中一方面强调“学习希腊范文”，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拘泥于范文，尤其不能作一个“奴性十足的译者”(Horace 1929: 472-473)。在拉丁语和希腊语双语教育普及、罗马中心主义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当时的罗马精英阶层普遍对古罗马文学创作有一种焦虑情绪，唯恐翻

译后的文字留下太多原作的痕迹，无法贴上自己的标签，将其据为己有。因此，无论是西塞罗还是贺拉斯，他们都曾努力地为自已译作的“原创性”辩护，并告诫后辈在模仿时应避免与原文过于接近。

1.3 白银时代：实用主义翻译思想

奥古斯都去世后的公元1—2世纪被誉为拉丁文学的白银时代。之前主要模仿希腊文学的罗马人，此时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的希腊文学体裁，也创作出了能与希腊经典相媲美的作品，于是开始以罗马的经典作家(如维吉尔、西塞罗)为模仿和竞争对象，并发展出创新和崇古两种倾向(王焕生 2008: 346-347)。随着罗马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罗马人不再对翻译寄以教育国民、振兴民族文化的厚望，而对其实用功能更为重视，开始将其应用于修辞教学、素质培养等领域。

1.3.1 昆体良：翻译与修辞教学

昆体良是罗马帝国第一位领受国家薪俸的修辞学教授，他所著的十二卷本《演说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既是全面而专业的修辞学著作，也是优秀的教育理论和文艺批评作品。昆体良在书中评价了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的重要作家，对西塞罗的作品和观点尤为赞赏，认为他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演说领域的集大成者(Quintilian 1876: 271-273)，西塞罗将翻译应用于修辞教学的做法也借由此书发扬光大。

《演说术原理》第一卷讨论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初级教育。在第九章中，昆体良介绍了在拉丁语教学初期的文法教育阶段，如何通过《伊索寓言》的翻译练习来帮助学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种翻译练习和西塞罗所倡导的做法非常接近，二者都提倡保留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在语言上大胆地创新。由于是为学童设计的练习，昆体良特别强调，在选材上要注重趣味

性，在难度上要注意循序渐进，以使其更符合修辞教学的需要。在《演说术原理》第十卷第五章中，昆体良以西塞罗等古典演说家的作品和观点为例，证明将希腊语译为拉丁语是古罗马演说家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老一辈演说家认为，将希腊语译成拉丁语是非常好的练习（方法）。在西塞罗的名作《论演说家》中，（曾提及）李锡尼·克拉苏说他自己经常这么练习。西塞罗自己也多次推荐这种方法，他甚至通过这种翻译练习，出版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米撒拉（Messala）也认可这一方法。在其现存的演说辞译文中，希佩里德斯（Hypereides）替芙里尼（Phryne）¹辩护的演说辞风格尤其精致，可与原文匹敌。这对罗马人来说颇为难得。这种练习的目的很明显：希腊作家们资源丰富，在研究雄辩技艺的时候引入了很多艺术手法；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他们所用的最好的词语，因为这些词语最终也可能归我们所有。但是对于语法形式——语言的主要修饰形式——我们可能还得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因为在这点上，拉丁语和希腊语差异很大。

（Quintilian 1876: 293）

可见，昆体良不仅像西塞罗一样看重翻译对于丰富拉丁语词汇的作用，他对两种语言在语法层面的不同也深有感触，认为翻译对于拉丁语言的语法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可以通过翻译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由于白银时代的罗马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经典，修辞学习的素材大大扩充，翻译练习也不再局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语际翻译”。昆体良将拉丁语内部的散文与诗歌之间、演说辞与演说辞之间的“语内翻译”也看作一种提高拉丁语能力的捷径。

1 芙里尼是公元前4世纪左右古希腊著名交际花，因在波塞冬节上裸泳被告上法庭，被指控亵渎神明，她当时的辩护人就是演说家希佩里德斯。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第二卷第十四章中，专门探讨了“演说术”或“修辞学”的术语翻译问题。他认为，拉丁语言在翻译希腊文字时总是存在词到用时方恨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诗人卢克莱修 (Lucretius) 也曾有类似的观点。不同的是，卢克莱修认为这是由拉丁语词汇贫乏和罗马人不熟悉这些话题造成的，有自我贬低的倾向¹；而昆体良则认为，在将拉丁语作品译入希腊语时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这是由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并不存在两种语言或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昆体良的观点一方面证明了罗马人的翻译思想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拉丁语言和文学的进步以及古罗马人已经真正树立起来的文化自信。

1.3.2 小普林尼：翻译与素质培养

昆体良的学生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对翻译的功能有另外一番见解。在他看来，翻译不仅可以提高人的品位，还可以提高人的洞察力。

小普林尼是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的外甥和养子，家境富有，仕途顺利。作为律师、作家和议员，他对罗马精英的社交之道和文学圈了如指掌，在他著名的十卷本《书信集》(*Epistles*) 中，关于罗马上层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通过这些措辞考究的信件，小普林尼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理想的罗马绅士，并建构出一个行为举止、思想观念及交际方式都合乎理想的罗马精英形象 (Johnson 2010: 35)。要理解小普林尼关于翻译的看法，只有结合这一历史语境才能看得清楚。

小普林尼有一封论翻译的书信极为有名，收录在《书信集》的第七卷中。他在回复格涅乌斯·佩达努思·福斯库斯·萨林内特 (Gnaeus Pedanius Fuscus Salinator) 的信 (7.9) 中指出：

1 当然，卢克莱修也有可能想通过强调翻译难度来为自己的译作辩护，或者反衬译作的优秀 (McElduff 2013: 149)。

很多人认为，无论是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还是将拉丁语翻译成希腊语，都是一种有益的做法。这种练习能使你的表达更加贴切、华丽，修辞手段更为多变，论述说理更具说服力；模仿这些典范之作最终能让你拥有（与原作者）相当的创作才能。此外，有些细节读者可能会忽略，但却逃不过译者的眼睛，这些细节能够培养译者的品位和洞察力。如果你阅读时足够用心，能在过后回想起原作中的内容和论点，不妨以竞争的心态将它们写下来，再与原作作比较，仔细思考你和作者各自在表述上的优点，这将对你有益无害。倘若你在某些方面强于他，你会非常高兴；倘若你处处不如人，则会羞愧难当。有时也可以选择（原作中）最有名的部分，与（译作中）那些最精彩的片段比较。这种竞赛尽管大胆，却不至于唐突无礼，因为它是在私下进行的。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这类竞赛中赢得了声望，也有许多人因为坚持不懈，最终超越了那些他们原本以为紧紧跟随就已足够的前辈。

（Pliny the Younger 1879: 225-226）

从信中不难看出，小普林尼将翻译视为一种修心养性的好方法，而且认为翻译可以培养译者的品位和洞察力，有效地提高其文学素养。这段言辞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即翻译是在与原作竞赛。虽然自西塞罗以来，译作与原作的较量说就一直存在，但小普林尼是第一位对这种“竞争”作了深入论证的人。这种竞争的需求实际上主要来自他的罗马精英前辈，他们将翻译的优劣与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当译文优于原文时，译者将获得同侪的赞誉；若译文比原文逊色，译者则会羞愧难当。这种愧疚感的产生并非出自对原作者的亏欠，而是因为译者自感技不如人。和以原文为中心的忠实观相比，古罗马的翻译伦理别具一格，但也正是这种独特的伦理观赋予了译者极强的能动性，使翻译活动本身具备了更多的现实功能。

1.4 教父时代：翻译与宗教

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罗马进入帝国后期，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5世纪后期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政权频繁更替，原本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最终分裂成东西两国。混乱的政局对经济、文化皆有冲击，这一时期世俗文学成就平平，反倒是基督教文学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基督教作家，如安波罗休(Ambrose)、哲罗姆、奥古斯丁(Augustin或Augustine)等，所以这一时期也称教父文学时期(the Patristic Period)。在这300多年里，关于翻译的讨论更为深入，不过探讨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世俗文学翻译，而是《圣经》翻译。

1.4.1 哲罗姆的务实翻译观：寻根溯源，形意结合

哲罗姆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精通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拥有丰富的《圣经》翻译经验，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与翻译相关的论述。《致帕马丘书》(“Letter to Pammachius”)是其翻译思想的代表作。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哲罗姆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他替朋友翻译了大主教伊皮法纽(Epiphanius)的一封希腊语信件，译文流传出去后被人指责不够忠于原文，是对大主教的大不敬；于是哲罗姆恼羞成怒，给朋友帕马丘(Pammachius)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指责批评者，一方面为自己辩护。

哲罗姆在信中谈及自己的翻译原则时如此说道：

我坦承，我从来不会用词语对词语的方法去翻译希腊作品，而是用意义对意义的方法去作翻译。不过只有翻译《圣经》时例外，因为《圣经》中连词序都具有有一种神秘感。

(Jerome 1956: 136-137)

为了体现意译法的理论权威性，哲罗姆大段地引用了西塞罗的《论最佳演说家》和贺拉斯的《诗艺》中关于翻译的论述。尽管这两位先辈对于翻译的理解同哲罗姆并不完全一致，但哲罗姆的引用却进一步建构了他们在译论史上的意译派先驱形象。

哲罗姆之所以选择意译作为文学翻译的原则，主要基于两大论点。首先，翻译中的绝对忠实很难做到，因为

可能我根本就找不到表达某些词语意思的对应词，于是为了达到目的，我不得不偏离正道，（就好比）本来只有短短一个街区的路程，却绕了好几英里的弯路。除此之外，还要面临词语变位、格的变换以及修辞手法纷繁多样等困难，而最困难的是如何反映不同语言自身特质的精髓。

（Jerome 1956: 138-139）

其次，硬译会破坏原文的样貌，哲罗姆打比方说：

如果有人还是不清楚翻译如何消减了原作的魅力，就让他以词语对词语的方式把《荷马史诗》硬译成拉丁语，甚至是拉丁语的散文。这样一来，文字的顺序将会显得荒谬可笑，最具才情的诗人也会变得笨嘴拙舌。

（Jerome 1956: 139）

接下来，他除了引用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的译意而非译词的观点和精修圣人依拉略（St. Hilary）的征服式翻译的思想之外，还指出世俗文学采用意译法不足为奇，因为《圣经》翻译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无

论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七十士¹，还是《新约》的作者和基督使徒，他们都没有采用严格意义上的词语对词语的翻译方法。哲罗姆随后一口气罗列了14个例子来说明《圣经》翻译中的删、改、错、漏等情形，并总结道：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内容而不是字词本身（Jerome 1956: 148）。

如此看来，哲罗姆对于《圣经》和世俗文学的翻译策略并非像一开始所说的那般不同——文学翻译重译意，《圣经》翻译重译词；实际上，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文本都应该摒弃硬译，注重对原文的形和意的双重传达。哲罗姆早在《纪年》²（*Chronicon*）的序言中就表达了对希伯来语版《圣经》的赞赏，他认为这些经文如同文学经典一般优美动人，可惜当时已有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译文将原文的节奏、韵律破坏殆尽，这是拙劣译者的拙劣翻译造成的。

还有什么能比《圣经》中的《诗篇》更悦耳动听呢？它就像我们的弗拉库斯（Flaccus）³和希腊的品达（Pindar）的作品，一会是抑扬格，一会是阿尔凯奥斯诗体；一会充满萨福的风格⁴，一会用半音步。还有什么作品比《申命记》和《以赛亚书》中的旋律更优美，比所罗门的《箴言》更庄严，比《约伯记》更完美？所有这些广为流传的篇章都像约瑟夫斯（Josephus）⁵或俄利根（Origen）⁶所写的那样，是用五音步和六音步的诗行写成的。（可）当我们读希腊语译文时，它们听起来已经意义有变；而在读拉丁语译本时，它们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

（Jerome 1893/2004: 760）

1 七十士译《圣经》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历史真相无从知晓，关于具体的译者人数更是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有70人，也有人说是72人。

2 哲罗姆的《纪年》编译自优西比乌（Eusebius）所著的《纪年》。

3 即贺拉斯，他的拉丁文全名为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译作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

4 阿尔凯奥斯和萨福是古希腊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创造的诗体是两种重要的古典诗歌形式。在前文贺拉斯的译论中也曾提及两位诗人。

5 约瑟夫斯是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对《希伯来圣经》研究颇为深入。

6 俄利根是早期希腊教会中著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通晓希腊文学，精通希伯来语。

哲罗姆曾接受过良好的修辞学教育，对于文体风格极为敏感，他推崇西塞罗庄严华美的文风及其演说家式的翻译风格，反对生涩的硬译。同时，作为当时教会中为数不多的精通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三种语言之人，他通过对比发现了逐词翻译的《圣经》希腊语译本和拉丁语译本的种种不足。虽然当时的《圣经》翻译伦理要求译者要绝对忠于原文，但在强大的宗教压力面前，哲罗姆仍然敢于否定主流的逐词翻译的方法。他指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在这种转换活动中，逐词翻译的弊端十分明显，因而他提出了“直译”“意译”相结合的《圣经》翻译主张。

在这些翻译思想的指导下，哲罗姆后来以希伯来语版《旧约》为基础重译了《圣经》，花了整整23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这一版本的《圣经》之后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标准文本；哲罗姆本人也因此被封圣，成为“圣哲罗姆”。他是中世纪之前欧洲最后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进入中世纪之后，教会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圣经》翻译，这一禁令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

1.4.2 奥古斯丁的神学翻译观：阐释与翻译

奥古斯丁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本人并未从事过大量翻译工作，只是校订过《圣经》拉丁语译本的某些部分。不同于哲罗姆从语言转换层面来理解翻译，奥古斯丁对翻译的理解始终与解经相关联，极具神学和符号语言学色彩。

奥古斯丁著述颇丰，他的与翻译最为相关的代表作是《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该书共分四卷。奥古斯丁关于语言和翻译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论基督教教义》第二卷，该卷的核心议题是符号。他认为符号有两种——自然符号和约定俗成的符号，而语言属于后一种，也是人类用来交流的最主要的符号。基督教教义认为，巴别塔倒塌之后，人类的语言和思想陷入混乱，互不相通。《圣经》最初也是用一种语言写的，但后来被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传播到四面八方，这样各族人民都能

研读它 (Augustin 1890: 757)。在此, 奥古斯丁肯定了翻译对于传播《圣经》的积极作用以及《圣经》译本存在的必要性。然而, 在阅读《圣经》时, 不认识的符号或者语义模糊的符号会妨碍人们的理解。语言中的符号有实义符号 (proper sign) 和喻义符号 (figurative sign) 之分。奥古斯丁 (Augustin 1890: 762) 指出, 对于不认识的实义符号, 可主要借助语言知识来理解。他认为拉丁语读者需要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知识来帮助他们, 因为众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说法不一, 有时只有借助原文才能解惑。

译者的能力和判断决定了译文 (的呈现形式)。当他们译法不一时, 除非我们借助他们翻译的源语来考证, 否则很难理解他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此外, 如果译者学识不够渊博, (其译作) 往往会偏离作者的本意。有鉴于此, 我们必须掌握《圣经》拉丁语译本的源语言, 或者获取那些逐词翻译的译本, 并非因为这样的译本足够好, 而是因为这些译本的译者往往在字词和意义层面都紧随原文,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译本校正其他译者自由发挥的译本, 或纠正其他译者的翻译错误。比方说, 有些译者希望沿用拉丁古语的用法, 把一些根本无法翻译的单词——有时甚至是整个短语——译成拉丁习语。尽管这样的翻译并不影响 (读者) 对全篇的理解, 但对于那些更乐见保留事物符号纯洁性的人来说, 这是极大的冒犯。

(Augustin 1890: 764)

奥古斯丁在此明确地表达了对《圣经》以往的拉丁语译者的不信任: 译者既可能因学问不够而误译, 也可能因翻译策略过于自由大胆而使得译文的意思偏离原意。在他看来, 词语对词语的翻译是再现《圣经》本来面目的唯一途径, 虽然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本可读性不高, 但这样的译本更便于读者追溯原文。此外, 他还明确地反对用拉丁习语翻译原文的做法, 认为这样会“冒犯”原文的“符号纯洁性”。

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中始终没有将译经者归入解经者的阵营。实际上，他和持“上帝感召论”的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¹一样，认为译经者的能动性是有限的，他甚至反对译经者发挥太多的能动性。在他看来，好的译经者应当尽可能地在字面上追随原文，不轻易地将自己的理解放入译文之中，而将阐释的工作留给解经者。

奥古斯丁虽然和哲罗姆一样对原文极为重视，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对于哲罗姆来说，追本溯源可以使翻译更准确，而奥古斯丁却认为这是为了维护阐释的准确性和正典的权威性。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圣经》拉丁语译本可以将上帝的智慧完美地传递出去，他甚至也不对译者作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在他眼中，虽然译本的语言各不相同，但神的旨意却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能理解”（Augustin 1890: 763），奥古斯丁认为，只要带着对上帝的信仰，仔细研读、正确理解《圣经》的不同译本，就一定能聆听到上帝的感召。

1.5 结语

本章所介绍的古罗马翻译思想跨越了拉丁文学的三个发展时期，主要研究了六位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译论。若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看，这些关于译什么、如何译的经验之谈，似乎大多只关乎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然而，若将其置于话语的语境和历史的维度中去考察，这些古老的译论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比如，被称为意译派代表人物的西塞罗其实在不同的人

1 与《亚里斯提亚书信》（*Letter of Aristeas*）中所讲述的故事不同，犹太哲学家斐洛认为，七十士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没有集体商讨、共同翻译，而是每个人都逐字逐句地翻译了所有经卷。虽然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未互相协商，但最后所有人翻译的结果却完全一致。斐洛认为，这足以证明七十士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了上帝的感召。

生阶段其翻译动机和方法并不相同；同处黄金时代的贺拉斯尽管和西塞罗一样反对硬译，但他的意译主张却和拉丁语诗歌发展的具体语境更为相关；还有后世的哲罗姆，其对西塞罗意译思想的推崇，表面上与世俗文学翻译相关，实际上却是对当时主流《圣经》翻译规范的反抗。事实上，除了这些代表人物之外，古罗马还有很多历史人物的译论值得挖掘，如老塞内加 (Seneca the Elder)、革利乌斯 (Gellius) 等人都曾发表过对翻译的看法。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古罗马人，其所关注的翻译问题、表达的翻译主张不尽相同。他们的翻译思想既是个体利益和诉求的投射，也受群体意识和行为的裹挟。回归语境，见微知著，这也正是翻译理论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曾经荣光无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转入颓势，文学经典也大量流失。中世纪时期，希腊语在欧洲西部几乎被彻底遗忘，而拉丁语则保住了通用语的地位，部分拉丁语典籍依靠修道院僧侣们的传抄保留了下来，欧洲西部各国在吸收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拉丁语言养分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各自的民族文学。不过，当时为数不多的翻译活动仍然受限于宗教目的和宗教组织。与此同时，欧洲东部的拜占庭帝国虽仍自称为罗马帝国，但其与欧洲西部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随着官方语言拉丁语被希腊语所取代，除法律外的拉丁文化遗产在欧洲东部也几乎荡然无存。倒是在伊斯兰教占领的周边地区 (如西班牙)，因为统治者宽容开放的政策，大量古希腊罗马典籍被翻译和保留下来。直到十一、十二世纪，西方城市开始兴起和繁荣，文化需求重新高涨，许多被遗忘已久的希腊罗马经典随着欧洲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被重新发现并通过翻译活动流传开来，新知识和新思想才开始大量涌入各个城市。这场被誉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运动通过翻译为西欧找回了哲学和科学的源头，实现了西欧文明的再次繁荣，并为15世纪文艺复兴的发生作好了铺垫。